陈独秀也强调自己没有“学位头衔”,“从来没有在大学教过书”。蔡元培之所以要拿这么一份不确切的履历递交教育部，目的就是要保证陈独秀顺利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蔡元培为何帮陈独秀造文凭

1917年1月11日,蔡元培正式致(函)教育部请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全文后附履历一份：陈独秀,安徽怀宁县人,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这份公函1月11日发出,13日范源廉就签发“教育部令”第3号:“兹派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此令。”

蔡元培急急忙忙办理陈独秀的任职手续，一方面,是北京大学文科的工作急需学长,另一方面,也是有点心虚,怕教育部不同意任命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因为公函中所附的陈独秀“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的履历,都是假的,也可以说,是蔡元培为应付教育部的官僚而为陈独秀编造的。

陈独秀根本就不曾毕业于什么日本大学 。陈独秀一生5次东渡日本,每次在日本的逗留时间都不长,没有接受过日本全日制普通大学的学历教育,更没有在所谓“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1901年10月,陈独秀首次赴日留学,先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补习日语,就读于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前身)。

陈独秀第二次东渡日本,是与潘赞化相伴进成城学校(日本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陆军科。陈独秀与同学汤尔和都关心时事政治,遂结成好友。汤尔和尤为赏识陈独秀的胆识和为人处世,埋下十几年后推荐陈独秀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伏笔。1906年暑假,陈独秀第三次到日本,与苏曼殊结伴,纯属暑假旅游。暑假过后,陈独秀和苏曼殊一起回国,在皖江中学任教。陈独秀利用“芜湖图书社联络党人,进行革命活动,被人告发,巡抚恩铭‘欲穷治之,羽书连下’，陈独秀被迫于1907年春又到日本东京,入正则英语学校学习英语。”这是陈独秀第四次到日本，而且也是“被迫”。1914年7月,东渡日本,帮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杂志》。这是陈独秀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去日本。陈独秀一生虽到过日本5次,但没有进入过“日本东京日本大学”,完全不可能“毕业”。

另外,陈独秀没有担任过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等职。安徽公学的前身是安徽旅湘公学。1904年冬，迁回芜湖改名为安徽公学。陈独秀是迁校的积极倡议者和推动者,热心推动安徽旅湘公学迁回芜湖，改办为安徽公学,但陈独秀并没有在校内任职。这一时期,他一方面热衷编辑《安徽俗话报》,另一方面躲在蔡元培租来的房子里,天天跟随杨笃生等人试验炸药,研究暗杀。陈独秀与蔡元培因此相识并结下友谊。陈独秀也没有担任过安徽高等学校的校长。安徽高等学校由陈独秀主持创办,但陈独秀只担任过教务长,没有担任过校长。

陈独秀也强调自己没有“学位头衔”,“从来没有在大学教过书”。蔡元培之所以要拿这么一份不确切的履历递交教育部,目的就是要保证陈独秀顺利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蔡元培是抱着整顿北京大学的决心出任校长的,而且立意从文科整顿做起,延聘教员从聘请文科学长开始。文科学长不但必须是“积学与热心的教员”，还必须具有革新的思想和勇于整顿的革命的精神。陈独秀当时是一员闯将,是影响最大,也是最能打开局面的人。

摘自《意林文汇》

邓世昌的工资单

邓世昌生前任北洋水师两大主力舰之一的“致远号”巡洋舰管带(舰长)。按北洋水师相关资料记载,邓世昌的武官阶级是总兵。在清代,武官的副都统和总兵为正二品大员(相当于中将),故邓世昌的官衔是非常高的。他的月薪是官俸1584两，船俸2376两，合计3960两。按光绪年间推算,当时大米每斤价格15文,折银0.015两;食盐每斤35文，折银0.035两;猪肉每斤40文，折银0.04两。以此估算:光绪年间一两银子在今天的购买力约合人民币100~150元。故邓的月薪折合人民币40~60万元,待遇是相当高的。致远舰上待遇最低的是夫役，月俸6两，折合人民币600~900元。一等水手月俸10两,折合人民币1000~1500元。这说明北洋水师在当时不仅是晚清军队中的骄子,舰上官兵的待遇也是无可比拟的。

邓世昌在1894年9月17日海战中捐躯报国。“致远”舰因舰体受伤弹药断绝。邓世昌指挥部下“快车”冲向日先锋指挥舰“吉野号”,决计与敌同归于尽。“吉野号”大怖躲避,并以快炮及鱼雷攻击,致使“致远”舰没入黄海,全舰300余名官兵仅余7人。

海战失利，朝廷震动。光绪皇帝垂泪撰联:“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并赐予邓世昌“壮节公”谥号,追封“太子少保”,御笔亲撰祭文、碑文各一篇。清廷还赐给邓母一块用1.5公斤黄金制成的“教子有方”大匾，拨给邓家白银10万两（折合人民币1000~1500万元)以示抚恤。

可见,当时的清政府在海防上是下了血本的。但国家政治的腐败已经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即使花了那么大的本钱,也挽救不了失败的命运。

摘自光明网

清政府如何颁发护照

近代老外在中国旅游,始于一百五十年前。

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同洋人签订《天津条约》,规定外国人“准执执照前往内地各处游历通商”。

“执照游历”,就是凭护照旅游。这在当时,实际上是个很麻烦的事。

那时,一提“护照”两字，清政府就一脑门子官司。对他们来说,这事一开始就不顺,麻烦不断。

《天津条约》签订时,“游历”与“通商”写在了一起。国门一开,清政府发现很多人不是来旅游，而是做生意。拿着旅游护照做生意,影响税收国策,清政府自然不允许，于是便与外国交涉,请求“游历”与“通商”分开申请护照。

那时，英国人刚战胜大清国,气焰正嚣张,并不以为然。1862年,在五口通商的牛庄，中国官员签证时，发现英国人的护照依然没有区别“游历”与“通商”,便拒绝盖章签发。英国驻牛庄领事态度强硬，甚至威胁说不给盖章,就持无印护照在中国旅游。不久，这个领事果然持没有中方盖章的护照，去沈阳凤凰城一带旅游，半路遇到了武装抢劫。英国领事坚持认为这是中方军队扮匪行劫,故意为难,竟自己组织武装护送……双方你来我往,冲突升级。一年后,双方交涉才有结果,清政府没办法，只好同意不修改条约。但协商规定:今后持游历护照进行商务活动的外国人，必须亲自到中国海关报税。

烦恼是无处不在的。游历护照发行十几年后,皇帝都换了两茬，清政府发现，竟然还没有统一护照格式。外国领事馆也发,总理衙门也发，地方政府也发,五花八门。正规点的还用印刷品，有的地方衙门干脆就随便涂画，不成体统。这才开始探讨统一格式的问题。另一个叫人头疼的事，集中在护照名字的填写上。大清护照当然是以中文为主，因此外国人的名字也填写中文译名。虽然也有在中文名字旁注写西文的，但当时各地验关官员没有几个识洋文的，因此还是以中文名字为标准。而许多外国人的中文译名不统一，也带来了麻烦。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十月,两个法国教士执护照从俄国入新疆。他们所持护照上的名字为雷钟和、王德美,但此前法国通知中国海关的文件上，两个人名字译为雷济华、王林度。名字不同,新疆方面拒其入关。后经往返查证，最终确认身份放行时，已是三个月以后了。

朝廷头疼，地方也烦恼。那时毕竟来华的外国人少,而朝廷又怕洋人,所以到了地方，更是将其当头等重要的政治任务来抓。沿途各地方官员,要求随时检验并派差保护,在接待及保护方面投入很大,生怕万一洋人出点事,搞出交涉事件来，可能被罢官。当然,地方官通常会将这些负担转移到百姓头上,摊派供应车辆等劳役,百姓不堪其扰。更有一些洋人见风使舵，趁机向地方官勒索。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一个法国人在新疆游历,作威作福,到处勒索,还奸宿当地幼女。地方官民都敢怒不敢言，因为他身边有好几个清兵做保镖。

当然，烦恼也是相互的。对于那些真正的外国游者来说,也大有苦水可倒。

比如旅游范围,《天津条约》规定:即使在华工作生活的洋人，出口岸百里以外,都得申请护照。当时法国驻华公使出北京城赴晚宴，都得向外务部申请护照。而外国人在华游历,护照上必须写明起止地点,“除仍注明省份外,另将欲往何处府县地方详细开列”,包括填写所经过的地方详名。旅游地域一般不准超过四个省。1907年,两广总督发现英国人报送的护照上,有写“十八省”(清朝全部行政省区）的,便断然拒绝。

由于战争及语言文化背景不同等原因，当时中国人对西方人普遍存有戒心甚至敌意。外国人在中国内地游历，往往会受到冷落与刁难。清政府人为设立种种限制与繁琐手续，也增加了外国游历者的负担。外国旅游者在华,所经过地方州县都要向地方官报告，同时沿途查检护照，层层过卡，不胜其烦。所到之处要有地方官差随同,名为保护,实为监视。如果你想自助游,很可能遇到麻烦。1874年冬,两个英国人从烟台前往开封游历。到了开封城外,发现当地官员已暗中传令所属,不准放二人进城,也不准渡口渡送二人。附近的旅店，也奉令不准留宿洋人。当然,那时外国人想去西藏，那就是做梦了。因为，西藏一直就没有对外国旅游者开放。

即使有如此多的麻烦与不便,还是挡不住大批的外国人拥入中国探险游历。清末江苏镇江关的一份档案显示:1900年一年中,该关签发过的外国人游历护照就达208张。

摘自《中华遗产》

中南海电话要求高

1949年7月,中央领导搬进中南海，中南海专用电话局正式开通。1952年7月，局号定为39,对外称“北京电话三九专用局(简称三九局)”。单位规定,“三九局”的话务员每月只许回家一次，不许在家住宿,不许随便外出,不许与亲友通信，不许向亲友透露自己的工作地点和任务，不许听领导同志的电话。

领导们来自不同的方言区，话务员多是北京姑娘，要听懂领导的话就得揣摩各地的方言，要接通每一个电话，就得记上千个号码，还得掌握领导每天的大致工作情况，所以话务员一般跟领导的秘书很熟。

在专用局里，话务员不只是转接电话，还必须负责接通电话，只有找到要找的人并通上话，话务员的任务才算完成。话务员实行轮班制，为了保证迅速准确地接通电话,每个话务员上岗前都得先翻看、记忆总台上的一本记录本，本子上记录着领导秘书提供的每位领导一天的具体行程安排。掌握了这些，才能知道在哪里能找到哪位领导。

一天，周恩来刚从中南海出去，毛主席有急事打电话找他，总机话务员根据周总理的行车路线,判断出周总理大致的位置,并立刻通知交警。当周总理的轿车行进到一个路口时,突然亮起了红灯。就在周总理摇下车窗想询问出了什么问题时，过来一名交警“啪”对总理行了个标准的立正礼，低声地说道:“毛主席有急事找您,请您立即回中南海！”

分配到三九局的话务员，先得进行三个月的培训、背电话号码,局里负责的领导拿着秒表考核。值机工作后，还要根据首长要联系的人员了解组织系统,随时注意积累国务院、人代会的人员任免名单,这些只能牢记在脑中不能留文字。还要对各部长、副部长、秘书长的姓名、电话号码及时掌握，达到首长说个人名,就能听准,不打岔、不反复问。

话务员还要值守长途台,同时负责给用户查电话号码。长途电话要做记录而后通过北京长话局专线台转出去。要做到快速记录,就要学习地理知识,掌握各省会、简称、甚至各大省市大的招待所的名字。同时还要学习百家姓,只要用户告知姓名，就能按规定的用话向用户解释,如姓赵解释为走肖赵,姓甄解释为西土瓦甄，而且还不能使用禁用语。如姓牛,不能说是牛马的牛,必须说是午字出头的牛等。

当时话务员的月工资是80多元,工作中的差错分小、大差,严重差错及事故,差错多少与评奖挂钩。如错叫了一次一般电话，只要响铃了虽未接通仍视为差错。红电台首长的电话更严格，只要插了一下用户塞孔，没摇用户也算大差，摇了首长拿起机子视为严重差错，接通讲话为事故。

还有，夜班不能随意摘耳机子,值机不论何时都要坐姿端正,持塞待接。渴了也不能任意离席喝水。背号、查号要定期检查,每次考核100个号码,每人成绩通过图表进行公布。

摘自《新民晚报》

感动于凋败之美

一天,一个十年未见的旧友忽然来电话，他说,他看到了我在新浪博客上的一张新照片,这照片使他感慨和心酸,使他感到岁月的无情,他希望把这张相片换掉,换成我十年前“青春靓丽”的照片。

他的电话使我想到这个话题。在我的感觉里,青春的美的确是光洁明艳、饱满灿烂、流光溢彩的,哪怕是掺杂了情绪化或者偏执的成分，哪怕青春是愤怒的,是敌意的,它依然是美妙的,令人羡慕的。但,仅仅是羡慕而已。它似一阵清朗而飘忽的风，抚在脸颊上,可一低头就不见了;如一声或清脆或低绵的呼唤,清晰地浮游而来,可一回眸就消散了,不见踪影,脆弱得转瞬即逝。

在我的审美感受中还有另外一种体验——不见得“怦然”然而的确“心动”的美,它是成熟的、内敛的甚而是沧桑的、凋败的,她的目光深澈,眼神盛满内容,眉宇间似有一种顾盼在无声倾诉,她的步履沉甸而从容，肌肤也在阅历的磨刀石上打磨过了，她的身上散发着古典主义和现代主义相混合的奇异味道，散发着由倦怠滋生出来的幸福感，由深刻的孤独演变而来的随和淡定，这综合的味道让人驻足流连,让人久不散去,甚至多年以后,在某一个怀旧伤古的初夏或者暮冬时辰，我们依然会被笼罩在一种莫名的、痛苦的想念中。

这样一种由内向外散发出来的神韵,便美得令人心痛、令人心碎了！这样的美,美得有“毒”!

这样的美,是需要闭着眼睛来看的。如果说,青春的美是用皮肤来表达的,是用来触摸和感知的话;那么,成熟的甚而凋败的美便是从骨头里渗透出来的了,成为一种韵味，让我们感怀,让我们疼痛。除了想念,还是想念。

这也是为什么在落花流水般的岁月中,在浮光掠影的日子里，推杯换盏、觥筹交错之间,依然有人牢记着那一句迷人而伤感的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台词:“那时候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

华年已逝、青春不再,岁月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脸孔和内心都雕刻了流过的痕迹。盛开是一种美;凋败更是一种美。在华美与凄美之间,我选择后者。

摘自《当代文萃》

难忘半支烟

宣金祥

人生进入“知天命”之年,我仍未学会抽烟,并且,这辈子也不想沾。回想起来,我曾经抽过一支烟。不,是半支——抽一半扔了。

那是当兵的第二年,南部边疆的自卫反击战爆发,我所在部队奉命开赴边陲。出发前,老班长对我说:“宝峰呵,吃光花光,打起仗来心不慌。”我打开小包裹,数一数里面还有92元钱,心想前天妈妈来信说家里屋漏了，我怎忍心吃光花光?于是我将90元钱连同一双解放鞋、一套新军装一起送邮局寄回了家。邮费1元2角,身上还剩8角钱,我走进军人服务社。

柜台上的新鲜梨子吸引了我的目光。老家是不长梨子的,我22岁了,还不知道梨子的滋味哩。掏1角钱,我买了两个。咬一口,又脆,又甜。在我上战场前,终于知道了梨子的滋味。接着,又买了10只信封、1支牙刷和1块肥皂,还剩3角6分钱。我朝售货员面前一推,说:“随便什么,紧钱买吧。”于是,售货员甩给我一包大前门香烟。我拍拍口袋,无钱一身轻,打起仗来只管往前冲啦!

不久,我们就乘车向南部边境进发。火车一个劲往前开，两天两夜过去了,不知开了多远。这天中午饭后，我挪身到车厢门口,一棵棵不知名字的热带参天绿树“刷刷”后移,一座座村庄旋转逝去。不知乡关何处,亲人何方,我的眼睛有些湿润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老班长坐到了我的身边,也望着飞逝而去的景物出神。我掏出大前门,拆开,抽出一支,先给老班长。他两手一合划火柴点燃,长长地吸一口,缓缓地吐出。我又抽出一支，放鼻子上闻闻,有一股清新的香味。我接过老班长的烟头，对上火,吸一口,没点着。班长说:“轻了。”再重吸,烟丝发出轻微的爆裂声,一股烟夹着怪味直往喉咙、眼睛和鼻孔里钻,我的眼泪、鼻涕一下呛了出来,难受极了。

火车在一个军用小站停下，有人喊:“下车活动20分钟！”我跳下车门,沿站台散步，手上香烟还没熄,又轻轻吸一口,努力从鼻孔送出去,感受比刚才好了一些。看样子,我把这支烟抽完，就能把一包烟抽光;把一包烟抽光,抽烟的动作要领也就掌握得八九不离十了。我准备再吸一口,突然,背后传来一个声音:“你怎么学抽烟了?”哦,是咱连长。连长穿一身新军装,腰里扎着武装带,手枪上包着的红绸布像火焰在燃烧。连长眼神里带着几分责备。我们全连100多号人,就连长打过仗——上世纪60年代在珍宝岛参过战。我没敢再抽,把香烟扔到了铁轨下,斜眼瞟,它还在冒烟,正燃去一半。

集合哨音响了,连长站在队列前,目光从每个人脸上掠过,停在我身上,命令道:“四班副出列，指挥唱歌!”我跑步出列,看一眼队伍，挥手唱起《我是一个兵》:“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革命战争考验了我,立场更坚定……”

音乐的节拍在我胸膛激荡,歌声如雄风响箭飞越站台。到了战场上,我们这支队伍,竖起来将是一堵铁壁铜墙,砸下去将是一把钢刀铁锤。

晚上，连长坐到我对面,沉默一会儿,说:“小薛,你想抽烟就抽吧！”我摇摇头。连长望着夜色,说:“我也是当兵第二年碰上打仗的,也买了一包香烟,想解解闷。这时,我看了一本战斗英雄写的书,这位英雄遭受过失恋的痛苦，学会抽烟,但在奔赴战场前,毅然宣布戒烟,他想在告别人生前改掉这个不良习惯。我把那包烟扔了,这次也没买。”

连长说的那位英雄,是前苏联的保尔·柯察金,书的名字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火车又开了一昼夜,到了边境。很快,我们连进入前沿阵地。在边境的半年中,我们光在猫耳洞里就猫了3个多月,打了大大小小40来次仗。部队换防时,除我那6位好战友永远地安眠在边境线上外,咱连百十号人都安全奉命撤出战斗。在整理物品时,我发现了那包大前门，便送给了老班长。他一闻,说:“霉了。”随手扔进了战壕。我挖了一锹土,把它埋了。

回原驻地后，我上军校、当排长、连长、营长,直到转业干公安，一路走来,转眼之间20多年过去了。但我永远忘记不了那支烟和那场战争,它们已经成为我人生记忆长河里的浪花,不时地拍击着我的心田。

摘自《文化博览》

我只比你笨4年

王剑楠

我绝对相信这样一个事实:天才们是基数最小的部分人群之一。除去他们,我们的智力大多都是差不多的。

4年前,当我杀出人海赢得H大录取通知书时,我万分庆幸，虽然不是多么好的名牌大学，可这也是我努力加运气才好不容易换来的,心里十分自豪。但那次我碰上了你。

同是一年出生的,我站在大门口的姿态与你就相差了不止千万里。不是比服装、比家底,但确定我们恰巧是同学后，你随意的谈吐、优雅自信的手势、洞察力惊人的眼神等立马把我们的距离拉大到近乎无限远。我最开始的自信被你轻松地一压迫，立刻溃到爪哇国去了。

你谈天气直接讲到空气涡轮效应，谈运动跟我讲F1赛车转弯的技巧,谈文学直接讲萨特小说中哲学有多形而上学。我说电影你喜欢吧，你就说起默片时代伟大然而我全然不知道名字的演员们的表演功力你多欣赏。而指着松树，你又说起作为一个伐木工若是在冬天里伐倒一棵大红杉要如何注意纹理等技术。转过头来,你就说其实黑胶唱片的音质质感是别的东西替不了的。

等到我们被分到一个寝室，你又神奇而理所当然地从你不大的行李箱里把一切需要的生活用品、学习用品放在所有恰当的地方，并指挥着我一同重新安排寝室布局，还告诫我哪些东西需要注意使用，哪些去哪里采购可以找到最合适的，而你只不过比我早到一天而已。在那以后，我的位置跟你一比永远乱糟糟的，别扭又不整洁,而你的位置干净、合适，东西永远比我的显得恰到好久，看起来就养眼。

我彻底被你的光芒所遮隐在你的阴影中了。

我努力学习你却总可以轻易地翻过书后就告诉我注意若干个要点即可。自然，所有奖学金的第一等你也是谦虚地收了起来，只是找了一间不大但异常有格调的馆子请我吃了一顿你都能说出做法的好菜。

你的朋友全校都有，不是多到泛滥却每个都大有来头，你干起事情来从来都不愁找不到合适的人手和资源，偶尔消失一阵子后回来就做成了一件大活动或是用外快添了一件新行头。

我迷上了摄影，你就拿出几年前的旧设备小小武装了我一下，让我拿去“玩玩”。见到我这个菜鸟用那套机器后懂行的人都特羡慕我哪淘来的这么好的自配攒机，还问我这个二手的当新的卖不卖。我的照片你拿去给我参赛，结果得了个一等奖，其实我知道那是我临习你的构图你又给我设的暗房你帮忙洗出来的。

终于有一天，你开始发现我好像有些想法你没想到,而且还不错。你发现周围有人开始知道我的存在并且谈起策划来有人提议要我加盟。而那天拍照片时的一个技术细节你没争过我，最后想想说还是按我说的做更好。

毕业的那次聚会上，以我和你的名义，我们做了一声势浩大的活动,还有一场热闹而成功的散伙饭。在这之前,我知道了我在上海的公司被老总留下已定，而你在名牌大学异地保研成功。于是我们大醉一场，中间我们节目不断,你拉大提琴而我用DV做了个漂亮的短片，而且在你忘了曲谱的时候我给你鼓掌打拍解了围。一切都很完美。

回到寝室，你执意互换床铺，躺在我尚算干净的床上，看见我收拾好的不大的行装,你突然问我:“告诉我,你怎么把我撵上的?”

我爬到你的头旁边，对着你的耳朵小声说:“我只比你笨4年！”

摘自《成才之路》

带刺的巢穴

星竹

非洲红脸猴在夜晚睡觉的时候，总愿意躲藏在长满尖刺的灌木丛里。红脸猴的天敌都是很怕刺怕扎的，而这种特殊的灌木丛，枝条上长满了又尖又硬的树刺，睡在里面相对安全了许多。为此,许多人都为红脸猴的聪明叫绝,认为红脸猴是动物中最会利用自然条件的防御高手。

只有一直在非洲跟踪红脸猴的专家才知道,红脸猴的这一聪明做法,既防御了敌人，又伤害了自己。因为非洲丛林里的灌木,枝杈上的刺又尖又硬,狮子和野狗等猛兽固然很怕被扎伤，但躲在里面睡觉的红脸猴一不小心,同样也会被这些尖刺扎伤。实际情况是，伤到自己的概率竟然大于保护自己的概率。

更危险的是，一旦饥饿中的狮子或者野狗不管不顾,形成围剿,堵住灌木丛的出口，红脸猴的这一变化性选择，立刻就会成为自己的陷阱,必死无疑。

从另一个角度将,非洲红脸猴只认识到了事物的一面，而没有认识到事物的另一面：带刺的灌木丛对自己同样是一种危害。

紫斑鱼是海洋动物里最为漂亮的一种鱼，它的浑身布满了五光十色的颜色,阳光一照,闪闪发光。如此美丽的紫斑鱼，全身却长满了针状的尖刺,大小类似酸枣刺。又尖又硬,刺上带有一种毒素，这是紫斑鱼用来攻击其他鱼类的武器，不管什么样的海底动物，一旦被紫斑鱼的尖刺刺中,则无一生还。紫斑鱼是海底世界中浑身长满尖刺的动物代表，且毒性极大。

紫斑鱼在每次攻击其他鱼类时，都要先愤怒起来,以分泌出有效的毒素,也只有愤怒，才能使它身上的毒刺坚硬起来。因此,紫斑鱼的情绪越激烈,身体上的尖刺也就越坚硬,而越坚硬,它就会越愤怒。愤怒的情绪总是先要伤害到自己。所以越愤怒,紫斑鱼也就越被自己伤害。

因此，紫斑鱼大多寿命短暂，一条紫斑鱼在通常情况下能活七八年,而实际上很多紫斑鱼活不到两年。紫斑鱼是死于自己的愤怒，死于自己的“内伤”。

世界上还有许多这样的动物,它们无论是防范,还是进攻，总是先利用自己的负面情绪才能达到攻击的目的，而负面的情绪中是对自己不利的，也就是说,红脸猴、紫斑鱼总是在以牺牲自己为代价。这正像世界上的一些普遍道理:你在伤害别人的时候,必然先要伤害到你自己。这种颠扑不变的真理,适用于非洲的红脸猴，适用于海底的紫斑鱼，也适用于自然界中的任何一种生灵。当然也包括我们人类自己。

摘自《北京晚报》